



HAL
open science

**Quyuxing xitong diaocha fangfa zai dianxing yizhi zhong de
yingyong - yi Hanshu yizhi wei li 区域性系统调查方法在典型遗址
中的应用-以汉书遗址调查为例**

Liu 刘晓溪 Xiaoxi, Pauline Sebillaud, Li 李扬 Yang, Wang 王立新 Lixin

► **To cite this version:**

Liu 刘晓溪 Xiaoxi, Pauline Sebillaud, Li 李扬 Yang, Wang 王立新 Lixin. Quyuxing xitong diaocha fangfa zai dianxing yizhi zhong de yingyong - yi Hanshu yizhi wei li 区域性系统调查方法在典型遗址中的应用-以汉书遗址调查为例. *Bianjiang kaogu yanjiu*, 2017, 22, pp.287-312. <hal-03460628>

HAL Id: hal-03460628

<https://hal.science/hal-03460628v1>

Submitted on 18 Oct 2023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LIU XIAOXI 刘晓溪, SEBILLAUD Pauline (史宝琳), LI YANG 李扬, et WANG LIXIN 王立新, « Quyxing xitong diaocha fangfa zai dianxing yizhi yanjiu zhong de yingyong - yi Hanshu yizhi wei li 区域性系统调查方法在典型遗址研究中的应用——以吉林大安汉书遗址为例 », *Bianjiang kaogu yanjiu 边疆考古研究*, 2017, vol. 22, p. 297-312.

区域性系统调查方法在典型遗址研究中的应用

—— 以吉林大安汉书遗址为例

刘晓溪^{1,2} 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1,3} 李扬⁴ 王立新¹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2.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春, 130033,3.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NRS,UMR8155,CRCAO),巴黎, 75005; 4.温州博物馆, 温州, 325000]

2012~2014年, 后套木嘎遗址考古队连续三年在大安市新荒泡与月亮泡周边作了区域性系统调查。“区域系统调查(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又称作全覆盖式调查(Full-Coverage Survey),是以聚落形态为目的的考古调查方法。”2014年度在该区域调查时途经汉书遗址,并运用区域性系统调查方法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采集和记录。本次调查将全部队员分为四组(J、K、I、L组),汉书遗址就处于J组调查范围之内。汉书遗址是整个调查区域中的一处重点遗址,当然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以采集区为单位进行整合的一个小区域。本文以该遗址为例尝试进行遗址内部空间分析和聚落形态研究[3]。2007~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归城遗址的调查就可视为使用区域性系统调查方法针对单一遗址进行的调查和研究的范例[4],而此种方法的运用在吉林省尚属首次。

*本文为吉林省文物局委托项目(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成果(项目编号35712174144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与综合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5ZDB055);吉林大学《GIS支持下的吉林省古代聚落历时态考察》项目成果(项目编号450060522161)。

一、遗址概况和以往工作

1.遗址概况

汉书遗址是嫩江中下游的一处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吉林省大安市月亮泡镇汉书村东北约1千米处，月亮泡东岸的沙岗上，当地俗称此处为“北山”。遗址西、北紧邻月亮泡，向东、向南两侧地势逐渐降低。由于该遗址系一处典型的沙坨型遗址，受流水侵蚀和风力剥蚀较为严重，邻水一侧形成高耸的断崖，且因近现代以来长期的过度耕种，土壤沙化严重(图一)。



图一 汉书遗址位置示意图

2.以往工作

该遗址自20世纪50年代被发现，历经第一、二、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三普”资料尚未公布，其主要成果见于基于“二普”资料编纂的《大安县文物志》。截至目前，历经两次重要发掘，第一次为1974年，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的发掘，发表有简报6;第二次为2001年，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的发掘，资料尚未发表。根据《吉林省文物地图集》“汉书遗址”条目的记载，汉书遗址的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8]。

从第一次发掘简报公布的资料来看，发现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等，出土遗物有陶器、铁器、铜器、石器、骨器等。发掘者将汉书遗址分为两期，简报中提及的“汉书一期文化”即后来学界通行的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则因该遗址发掘命名，遗存时代约为青铜时代中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即白金宝文化时代约为西周至春秋时期[9]，汉书二期文化的年代约为战国至西汉[10]。

二、本次工作情况及方法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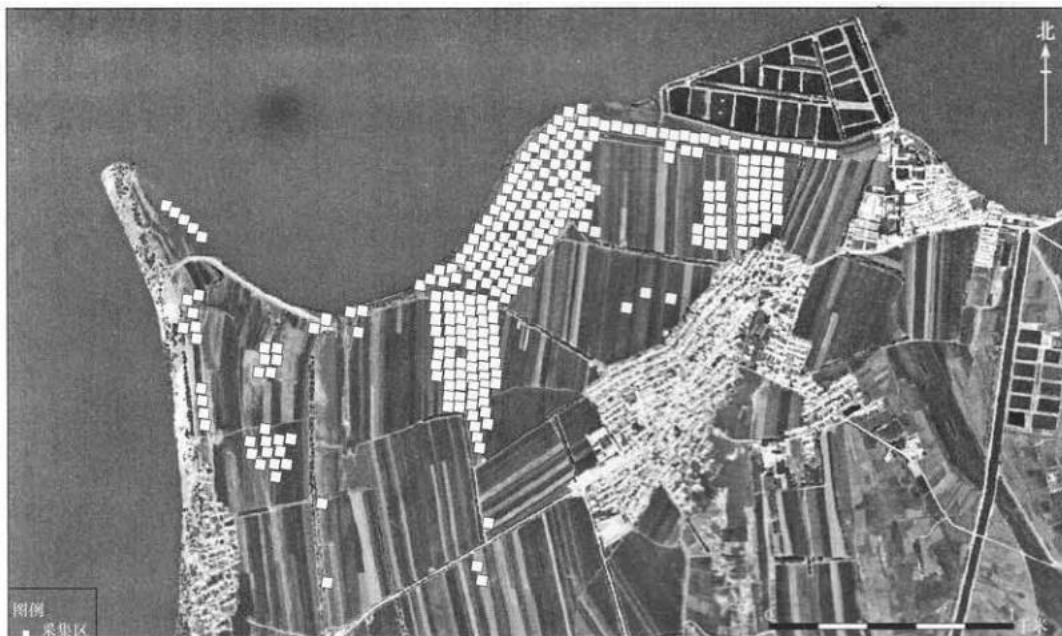
首先将参与调查工作的人员分为4组进行拉网式调查，每组3~4人，全程步行，保持人与人间距50米左右。由于最后的分析都是以采集区为基本单位，所以采集区范围的划定和采集遗物的方法就尤为重要。原则上在一个地点发现两片以上的陶片(需排除为耕地上肥而运去的可能，常伴有许多现代垃圾)即作为一个采集区，采集区的规格为50米×50米。同时根据地表遗物的丰富程度选择做一般采集或系统采集。一般采集系在地表遗物相对稀疏的情况下，对整个采集区内所有遗物做全面收集；系统采集是在地表遗物较为丰富的情况下，在采集区内画一个或多个(不超过5个)半径为1.8米的圆圈(面积约10平方米)，圈内所有遗物做全面收集，系统采集的遗物数量整体以不少于30个为标准。每个采集区内采集到的遗物均代表着该采集区内遗物的文化属性和分布密度，采集区的数量往往是与遗址的面积相对应的，实际上绝大多数采集区内采集到的遗物都包含着不同时期文化的陶片，通过对采集区这一基本单位内采集遗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未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对一个遗址内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和密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调查过程中，除了严格按照既定的调查方法外，我们还利用了电子地图的导航功能对发现遗物的地点进行定位，同时与手持GPS测得UTM坐标进行比对和校正，用测距仪在现场划分采集区范围并进行遗物采集，根据采集过程行走路径，在已经准备好的大比例尺卫星图上精确找到采集区的位置，并做出明确标注，最后在野外现场填写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中的区域性系统调查记录表。

室内工作则充分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田野调查工作中所采集到的遗物进行分析和断代后，将分析结果和田野调查过程中的记录表格、照片等文字和影像资料，输入到利用Filemaker软件建设的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中[i]；将画在卫星图上的采集区等图形资料，利用AutoCAD软件在已有测绘图上进行精确标注和面积计算。然后通过地理信息系统(ArcGIS 10)进行空间分析，并用Adobe Illustrator处理矢量图与光栅图。最后结合吉林省田野考古数据库，对不同类型的文件进行链接，进而对调查所获取的全部信息做进一步统筹分析与研究。

三、调查收获与初步认识

我们在汉书村西北侧通过系统调查和采集，确认可归属于汉书遗址范围的采集区241个，采集陶片数量16487片，初步确定汉书遗址总面积约为60.25万平方米(图二)。



图二 汉书遗址采集区分布图

根据王立新等对该区域范围内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的认识^[1],将汉书村西北发现的遗存分为7组，归属五个大的时期。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一组；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分三组，即青铜时代早中期(包含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单从采集的细小陶片难以对二者做出进一步的区分)、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魏晋隋唐发现遗物较少，无法细分，归为一组；辽金时期遗存多为素面泥质灰陶片，限于现有认识程度，难以细分，归为一组；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一组(详见表一)。

表一 汉书遗址采集区数据表

组	时期	采集区数量	采集区面积(万平方米)	陶片数量	陶片总数百分比	密度(陶片/万平方米)
第1组	新石器时代中期	12	3	106	0.64	35.33
第2组	青铜时代早中期	30	7.5	303	1.84	40.4
第3组	白金宝文化	80	20	2675	16.22	133.75
第4组	汉书二期文化	143	35.75	7449	45.18	208.36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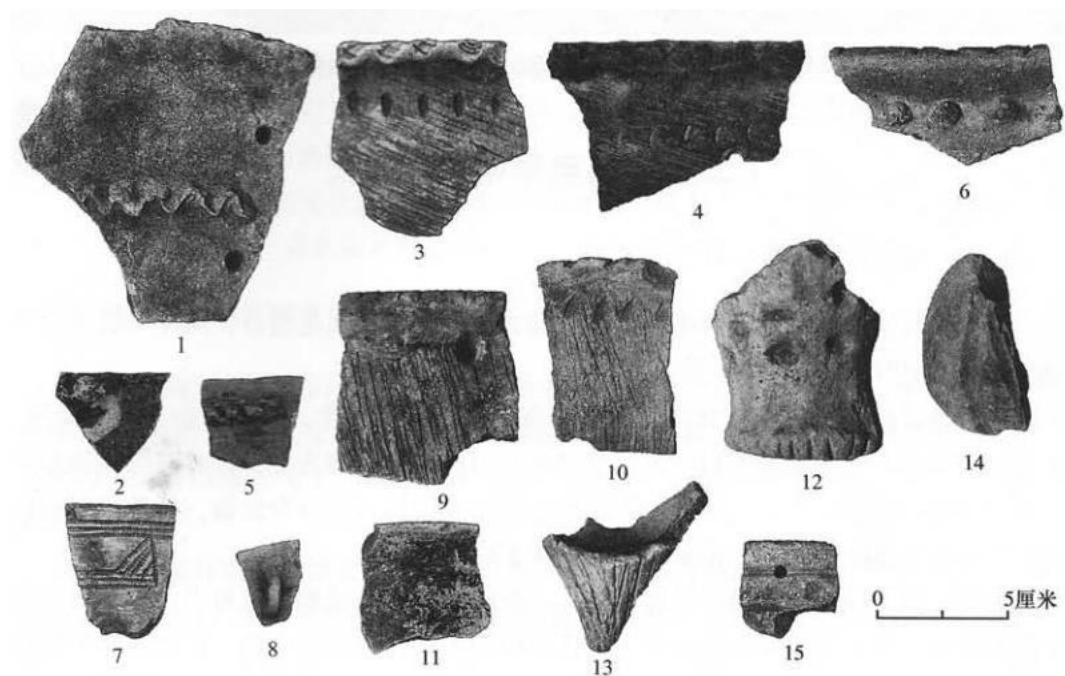
组	时期	采集区数量	采集区面积 (万平方米)	陶片数量	陶片总数 百分比	密度(陶片/ 万平方米)
第5组	魏晋隋唐	2	0.5	4	0.02	8
第6组	辽金时期	230	57.5	4944	30	85.98
第7组	晚清至民国	191	47.75	1006	6.1	21.07

(一)新石器时代遗存

第1组 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

调查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均以夹蚌粉的黄褐陶或灰褐陶为主，多为素面。少量带有指甲纹、附加堆纹陶片可明确划归以后套木嘎遗址第三期为代表的遗存(即2012年简讯中的第二期)(图三，1)。素面的陶片中大多数也与后套木嘎第三期遗存特征相似，由于后套木嘎二期与三期陶片的素面部分很难区分，部分素面陶片不排除有归属于后套木嘎第二期遗存的可能性。

通过与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比较，并结合后套木嘎遗址第二期与第三期遗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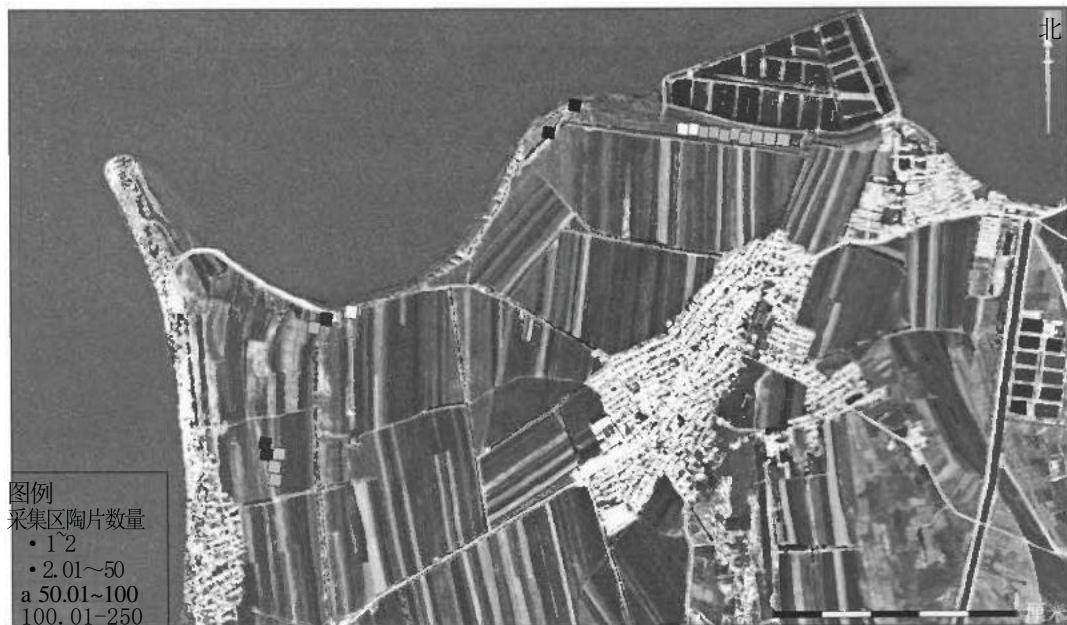


图三 汉书遗址采集标本

1.J269(新石器时代中期) 2.G005(小拉哈文化) 3.J2514.J2525.G004(古城类型)-6.J2507J2518.J252(白金宝文化)9、10.J252 11.J25412、13.J251 14.J323(汉书二期文化) 15.J250(魏晋隋唐时期)

碳十四年代测定，可将此组遗存的年代范围初步推定在距今8000~5600年前后。遗存主体应以后套木嘎三期为主，年代范围应当在距今6100~5600年前后。

采集区共计12个(其中2个系统采集),采集区面积3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106片(图四)。



图四 汉书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遗物分布图

(二)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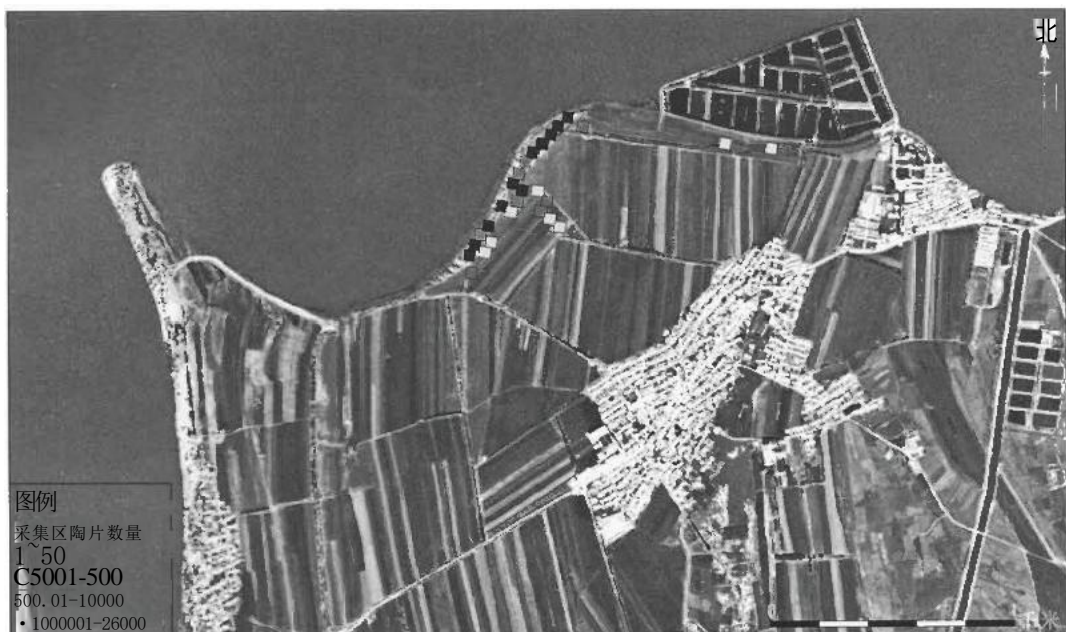
1. 第2组青铜时代早中期

青铜时代早中期实际包含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两种文化遗存，陶片与后地窝堡遗址发现的同时期遗存基本一致[3]。

该遗址发现的小拉哈文化陶片以夹砂灰(黑)褐陶为主，多为素面，器表磨光，有些陶片表面有装饰性的乳钉。古城类型陶片以砂质灰褐陶为主，饰有绳纹和条形附加堆纹，该时期即已出现与白金宝文化相似的篦点纹构成的组合纹饰，只是压印痕较之略浅，典型器物有花边口沿鬲(图三，2~5)。

除带纹饰的陶片和器物口沿部分外，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的相当一部分陶片区分较为困难，故此并不做细致划分，将其共同归为青铜时代早中期，这批遗存的时代大致在夏至晚商。

调查发现青铜时代早中期遗存的采集区共30个(其中1个系统采集),采集区总面积约为7.5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303片(图五)。



图五 汉书遗址青铜时代早中期(包括小拉哈和古城)遗物分布图

2.第3组白金宝文化

白金宝文化遗存的陶片多为泥质黄褐陶，泥质灰陶略少，另有少量的夹砂陶，器表均经过磨光，表面光滑细腻，陶器纹饰较为丰富，有压印的细密篦点纹构成的几何形和动物形纹饰，以及较为粗糙的绳纹(图三，6~8)。调查时还发现有少量石器，其中以穿孔的石锤斧最为典型。

调查发现有白金宝文化遗存的采集区共80个(其中37个系统采集),采集区总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2675片，占陶片总数的16.22%(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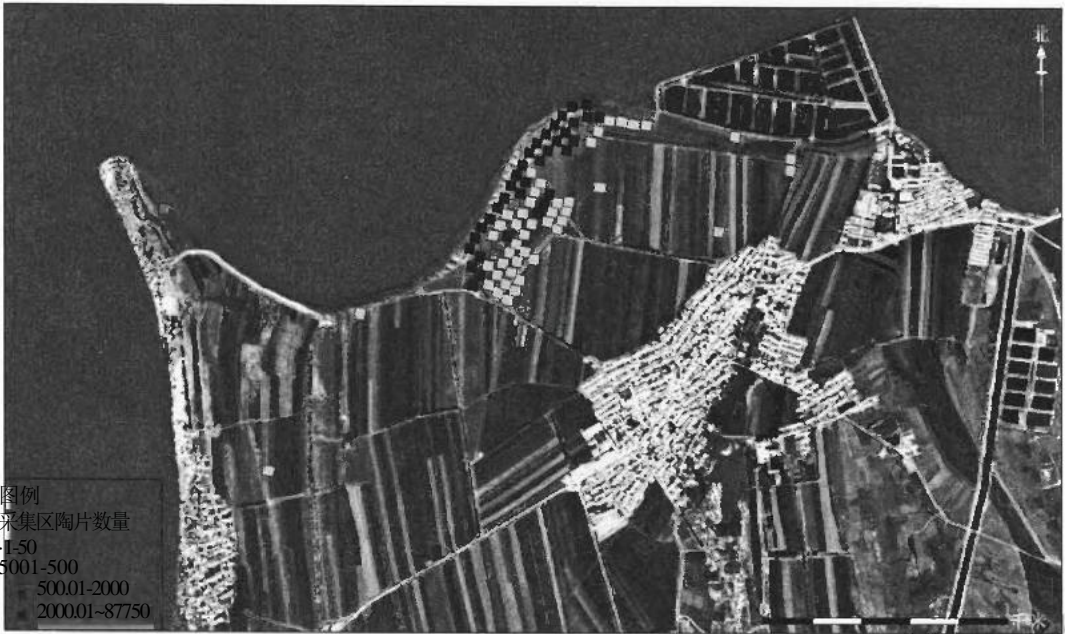
3.第4组汉书二期文化

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陶片多为沙质黄褐陶，少量的沙质灰褐陶，可辨器形有鬲、壶等，器表较白金宝文化的陶器略显粗糙，以素面为多，部分陶器表面施有红衣，陶鬲和陶壶的腹部饰有绳纹，绳纹较细，多呈线条状。另发现有陶网坠、支座等(图三，9~14)。

调查发现有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采集区共计143个(其中44个系统采集),采集区总面积约为35.75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7449片，占陶片总数的45.18%(图七)。

(三)魏晋隋唐时期

第5组魏晋隋唐时期遗存的陶片主要为夹砂陶，分为红褐陶和灰褐陶，陶器近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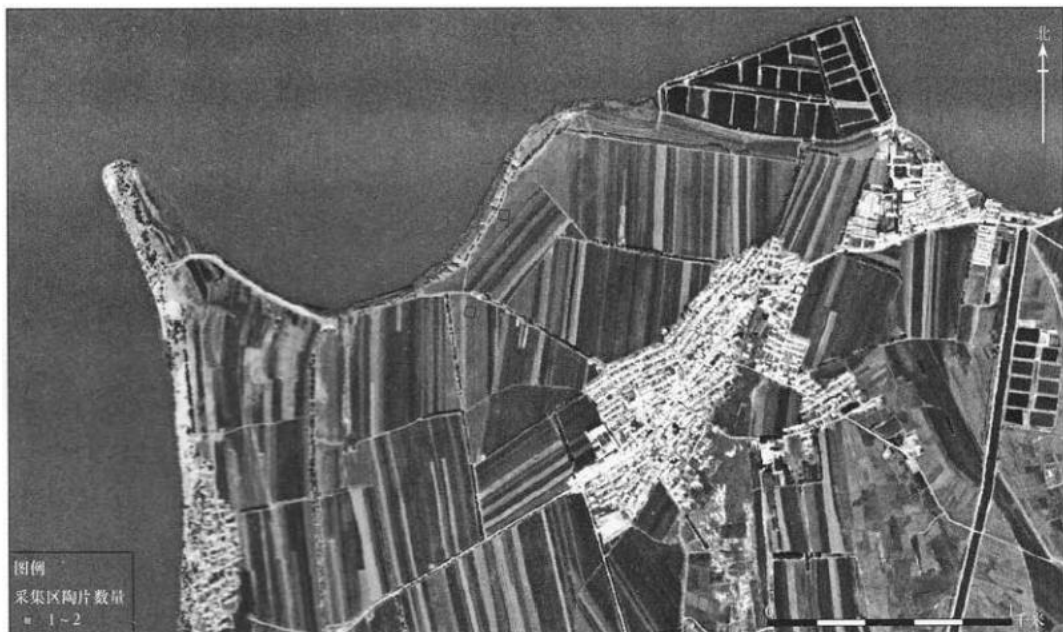
图六 汉书遗址白金宝文化遗物分布图



图七 汉书遗址汉书二期文化遗物分布图

沿处多有三道凸棱(图三, 15)。

调查发现有魏晋隋唐时期遗存的采集区共2个(无系统采集),采集区总面积约为0.5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4片(图八)。



图八 汉书遗址魏晋隋唐时期遗物分布图

(四)辽金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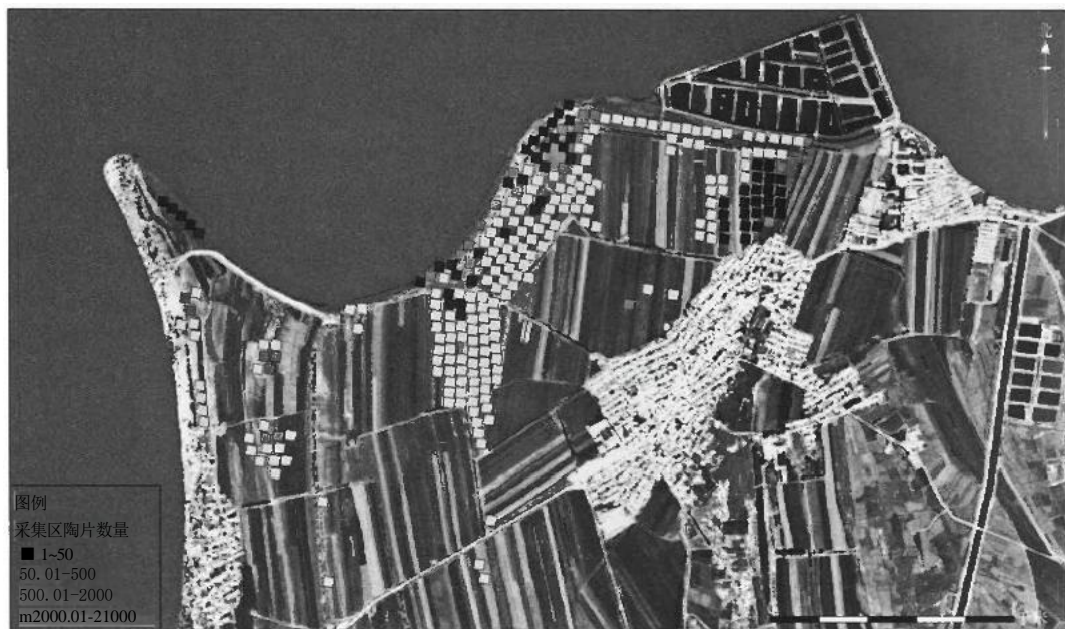
第6组辽金时期遗存的陶片多为泥质灰陶，发现的器物口沿多为卷沿或折沿，以素面为多，少量器表经磨光，可见纹饰有篦齿纹、垂帐纹、戳印三角形纹等。建筑构件发现有板瓦、筒瓦和青砖残块，均为泥质灰陶，瓦类构件内面印有布纹。其中部分瓦类构件的残块又经再次利用，被改造成网坠使用。

调查发现辽金时期遗存的采集区共230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57.5万平方米，采集陶片数量4944片，占陶片总数的30%(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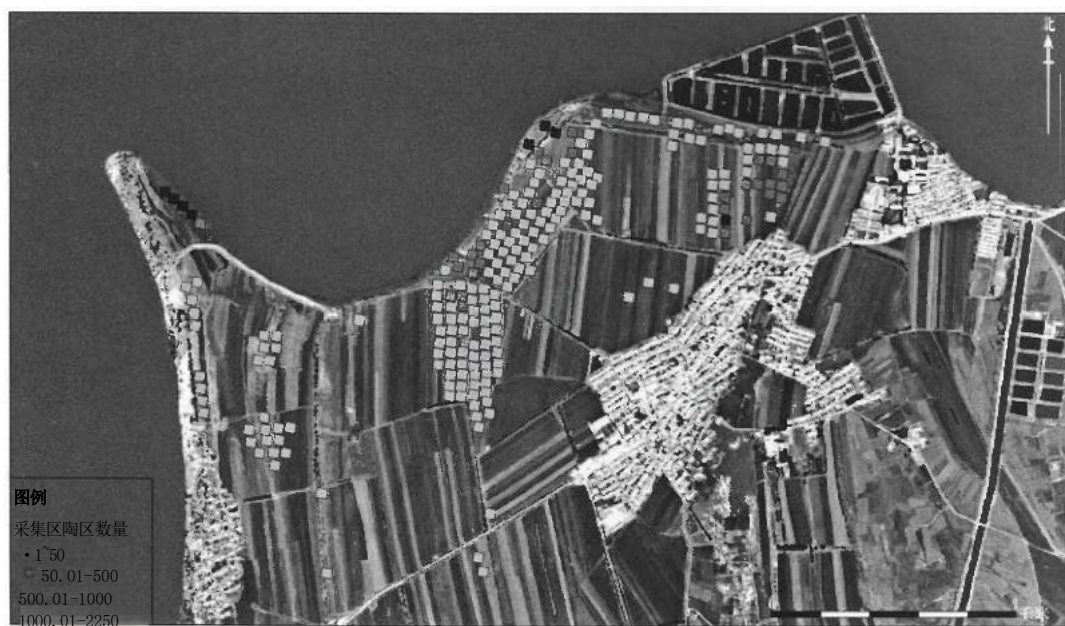
(五)晚清至民国时期

第7组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的陶片多为泥质灰陶，火候较高，质地更为细腻，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陶器可辨器形多为陶盆，陶盆口沿多为小折沿、尖圆唇，剖面近三角形。瓷片多为青花瓷片，瓷胎灰白，略显粗糙，釉色透明，多数为花卉纹，青花色彩灰暗。另发现有少量的青砖和纹饰砖等建筑构件。

调查发现晚清至民国遗存的采集区共191个，采集区总面积约为47.75万平方米，采集陶瓷片数量1006片(图一〇)。



图九 汉书遗址辽金时期遗物分布图



图一〇 汉书遗址晚清至民国时期遗物分布图

四、相关研究

1. 聚落形态的历时态观察

通过对采集遗物进行分析，可知汉书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清民国五个大时期的7组遗存。从不同时期采集区的数量、分布和遗物数量来看，魏晋隋唐时期并未形成稳定的定居聚落，此次调查，在遗址范围内仅于两个采集区中发现该时期的遗存，且仅采集到4片陶片，这种现象与近3年在该区域做系统调查的结果一致。汉书遗址应该存在有前后相继的6个时代的聚落，分别与第1、2、3、4、6、7组遗存相对应，从遗存的分布情况观察，现存遗址范围应该由6个时代的聚落错位重叠而成。

遗址范围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的采集区12个，分布于遗址的北部和东部，比较而言东部更为密集，东区有采集区10个。发现青铜时代早中期遗存的采集区30个，分布于遗址的西北和东部。发现有白金宝文化遗存的采集区84个，其中西区80个，现有汉书遗址的主体部分已基本成形，东区仅4个采集区且分布较为松散，采集遗物较少。发现有汉书二期文化遗存的采集区与白金宝时期分布范围大体相当，数量有所增加，西区132个，东区11个。发现有辽金时期遗存的采集区230个，在各个时代中采集区数量最多，遗存也最为丰富。晚清至民国时期遗存的采集区191个。

观察不同时代的采集区数量、分布，再结合遗物分布密度，可以发现汉书遗址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小规模聚落址，靠近水源，分布松散。进入到青铜时代，无论是聚落规模还是人类活动程度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至汉书二期文化时期达到第一个峰值，随着技术的革新、人口的增长，聚落规模也不断膨胀，与之前松散分布的状况相比，呈现聚集化、中心化的现象，整个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聚落都以西区为中心，外围分布有小规模的聚落或墓葬区。进入魏晋隋唐时期，无论活动于此地域的是鲜卑人还是契丹人，都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相较于农业经济而言同样的土地面积能供养的人口数量较少，且不断的游牧迁徙生活留下的遗物亦较少，故此从调查结果来看，该时期不存在稳定的定居聚落。辽金时期采集区数量与遗物密度的突然爆发与汉书二期文化阶段的稳步发展不同，是遗址内部多层聚落发展的另一个峰值，人口较魏晋隋唐时代突然膨胀，可知其经济模式已经发生转变，农业经济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聚落规模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晚清至民国时期聚落分布范围较辽金时期有所缩小，然采集区分布范围与辽金时期相比较，呈逐步向南扩张的趋势，也正是在该时期现有的汉书村开始逐步形成。

2.聚落内部空间结构分析

通过对聚落的历时态观察可以发现，汉书遗址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已出现东、西二区结构的雏形，东区遗存较为丰富，西区较少，人类活动以东区为主。在汉书遗址的西南约1千米月亮泡与榔头泡之间半岛亦发现有同时期遗存，呈南北两区分布，两区距离与汉书遗址情况相近。

青铜时代早中期聚落较新石器时代有所发展，但聚落规模仍较小，中心移向西区，采集区靠近水边分布，略向内陆延伸，东部仅有2个采集区。

白金宝文化聚落较之前有进一步发展，但其东西二区模式仍不明显，西区采集区较为集中，成为聚落的主体部分，所谓东区仅发现4个采集区且较为分散，西区的西南方向亦发现有1个同时期的采集区，距西区距离与东、西二区间相若，由于西区以外的采集区发现遗物较少且未经勘探和发掘，无法断定其是否为居址，从地图上观察，密度最高的采集区位于断崖边缘，长时期的侵蚀坍塌也会对判断造成一定影响，但至少可以认为是该时期聚落人群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

汉书二期文化时期聚落呈现扩张趋势，其东西二区模式已经成形，西侧为聚落主体部分，应为居住址，从采集区的分布情况看，西区主体聚落亦呈分化趋势，中部遗物空白区域，将西区分为东北、西南两个亚区。东区从采集标本观察，散见有较多的红衣陶片和细碎人骨，可能属于该聚落的墓葬区。主体聚落的西侧亦发现有十几个该时期的采集区，半岛前端东侧的5个较为集中，可能为一处临时居址，其南侧的10个采集区较为分散，应为人类活动的遗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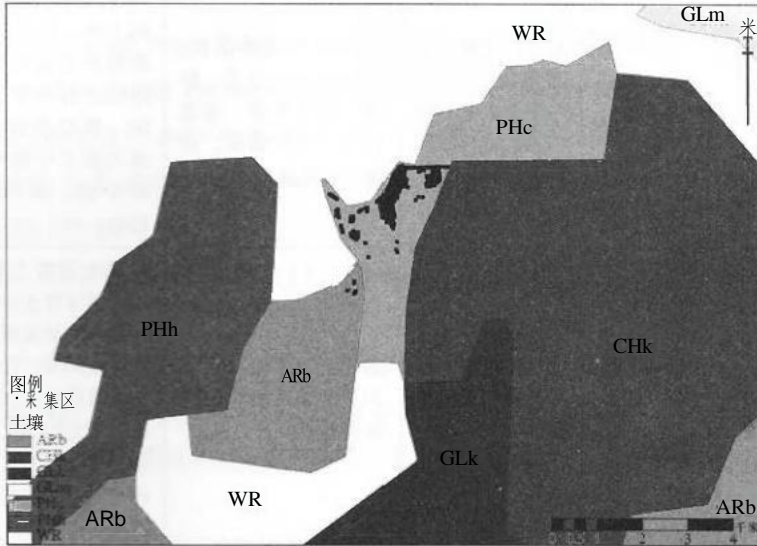
辽金时期聚落在汉书遗址多层聚落中规模最大，遗存也最为丰富，可知该时期较魏晋隋唐时期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聚落规模也急速膨胀，尽管所有采集区已经连接在一起，但其东、西二区的结构更为明显，从采集遗物判断，东西二区应均为辽金时期聚落中的生产生活区域，东区作为墓葬区的功能发生变化。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聚落范围大体与辽金时期重合，主体部分均在辽金时期聚落的范围内，但规模较之前有所收缩，仍延续辽金时期东、西二区的结构。

3.土壤与资源

汉书遗址地处月亮泡东南岸的台地之上，地势相对较为高平，濒临水域的土壤多为石灰性黑土和典型黑土，汉书遗址采集区主要分布于石灰性黑土之上，而距离汉书遗址不远的后地窝堡遗址位于月亮泡与榔头泡之间半岛上的典型黑土之上，两处遗址至少在青铜时代既已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定居聚落，且有部分阶段为共时性存在，可知人类在选择居址时，既要邻近水源取水方便，又要占据较高地势避免水患，加之肥沃的黑土更适宜供给定居聚落的农业耕作。再观察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后地窝堡遗址向南、向东主要为过渡性沙性土，以该类土壤为基础的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且相对贫瘠。

汉书遗址南侧为大面积的石灰性黑钙土。故此在后地窝堡遗址和汉书遗址所在区域形成两处颇具规模的古代聚落也并非偶然(图一一)。



图一一 汉书遗址采集区以及土壤类型

从聚落发展的历时性观察，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清民国时期，除魏晋隋唐时出现定居聚落的空白外，汉书遗址一直是人类择居的优选。濒临水域定居，除获取水源较为方便外，大面积的水域在特定的季节还可以为定居聚落提供丰富的鱼、蚌等水产品，作为食物资源的一种补充。另有一些水生植物诸如蒲草、芦苇等，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加以利用。

表二 汉书遗址采集区土壤说明表^[15]

土壤名称	中文名称	土壤特性	形成环境	分布
PHc (Calcic Phaeozems)	石灰性黑土	黑土沉积类似于黑钙土(Chernozems)和栗钙土(Kastanozems),但是淋溶更多。	适度大陆性气候,比较潮湿的草原和森林地带。地貌类型既有平原又有丘陵。植被多为草原,例如高草原或森林。	世界上黑土分布约1.9亿公顷。其中0.7亿公顷位于美国中部低地和远东的大平原地区。0.5亿公顷的黑土位于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亚热带潘帕地带。0.18亿公顷分布于中国东北大平原,俄罗斯中部和欧洲中部也有分布。
PHh(Haplic Phaeozems)	典型黑土			
CHk (Calcic Chernozems)	石灰性黑钙土	黑色,包含大量的有机性物质的表土层。	大陆性气候,丘陵地貌,以高草植被为主。	世界上黑钙土分布于2.3亿公顷,主要分布于欧亚和北美的中纬度高原,在有栗钙土地带的北侧。

* 图一一中英文对应的中文说明详见表二。

续表

土壤名称	中文名称	土壤特性	形成环境	分布
ARb (Cambic Arenosols)	过渡性沙性土	近现代逐渐沉积而形成的土壤，一般含大量石英的沉积或岩石风蚀之后的余沙。	典型无地域性沉积。地貌多样：沙丘、沙滩、沙土平原、古老台塬。植被稀疏，多为疏林草原。	13亿公顷，占全球土地面积的10%。风积而成，以中非高原的分布面积最大。其他沙性土分布于非洲萨赫勒地区、撒哈拉沙漠个别地区、澳大利亚中部和西部、近东和中国。沿海沙丘面积比较小。
GLk (Calcic Gleysols)	石灰性潜育土			
GLm (Mollic Gleysols)	松软潜育土	浅层呈红色、棕色或黄色彩色，深层呈灰色或蓝色。	潜育土为无地域性沉积，出现于所有的气候类型中。	世界上潜育土约7.2亿公顷。最大的潜育土分布范围在俄罗斯北部的亚北极地带、加拿大和阿拉斯加，以及潮湿温和的亚热带低地，例如中国和孟加拉国。大约2亿公顷的潜育土分布于热带，大部分位于亚马孙地区、赤道非洲和东南亚沿海沼泽地区。

五、结 语

本文进行的相关研究是以区域性系统调查资料为基础的，该类资料更适合浅层和宏观的研究，当尝试做进一步研究时往往感到受制于材料的局限而无法深入，例如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发掘的情况下无法对某一时期的聚落布局、功能分区进行深入探讨。截至目前，在汉书遗址的两次发掘资料尚未完全公布之时，仅依据调查资料得出的某些结论也难免有些偏颇，但运用此种方法针对重点遗址的调查和研究也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期待在汉书遗址发掘资料公布后，笔者继续对此文章的相关结论进行重新审视和认真修正。

附记：吉林大安区域性系统调查项目领队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王立新教授，2014年参与调查的人员有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史宝琳、付琳、王涛、杨琳，硕士研究生李扬、雷长胜、李轩鹏、潘静、张星翰，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晓溪，大安博物馆梁建军。地图由史宝琳绘制，遗物照片由史宝琳、耿杨和时西奇拍摄。

注 释

[1] 吉林省大安市区区域性系统调查工作是《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考古工作规划》中的一项，调查始于2012年，2016年完成。

- [2] 方辉.对区域系统调查法的几点认识与思考[J]. 考古, 2002(5):56.
- [3] Banning,E.B.Archaeological Survey[M].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2:121,197-209.
- [4] a.Li,Feng, Elizabeth Berger, Liang Zhonghe, and Jeremiah Trinidad-Christensen. Intrasite Organization in the Late Bronze-Age: The Application of Full-Coverage Survey Methods at Guicheng: Shandong Province,China[A].AsianArchaeology(2)[C].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1-39.
- b.Banning, E.B.Archaeological Survey[M].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2:121,197-209.
- [5] 陈相伟, 李殿福.大安县文物志(内部资料)[Z]. 长春: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员会, 1982: 25-30.
- [6] a.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吉林省文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 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136-140+88.
- b.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卷四十三文物志)[M]. 长春: 吉林省人民出版社, 1991:21-22.
- [7] 2001年的发掘资料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目前已进入报告编写收尾阶段。
- [8]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3:153.
- [9] 赵宾福.白金宝文化的分期与年代[A]. 边疆考古研究(第7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119-135.
- [10] 赵宾福.汉书二期文化研究——遗址材料和墓葬材料的分析与整合[A], 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96-116.
- [11] 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刘晓溪.后套木嘎遗址田野数据库的建设[A], 边疆考古研究(第14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89-102.
- [12] 王立新, 霍东峰, 赵俊杰, 刘晓溪.吉林大安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址[A].2012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2-7.
- [13]王涛, 杨琳, 王立新.吉林大安市后地窝堡遗址的调查与认识[C]. 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9-28.
- [14]刘晓溪, Pauline Sebillaud(史宝琳),王立新.吉林省大安市2012~2013年区域性系统调查简报(待刊).
- [15] 有关土壤的信息来自于:
- a.Nachtergaele, Freddy, Harrij Van Velthuisen, Luc Verelst, and David Wiberg. Harmonized World Soil Database (version 1.2)[M].FAO,IIASA,ISRIC,ISSCAS,JRC., Rome,2012.
- b.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Reference Base for Soil Resources 2006-A Frameworkfor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Correlation and Communication[M],Rome: ONU,2006.

通过ArcGIS 10处理。

Intra-site Analysis Using a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Method:A Case-study on the Hanshu Site

LIU Xiao-xi Pauline SEBILLAUD LI Yang WANG Li-xin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systematic regional survey on the Hanshu site, this article establishes the artifacts periodization, analyzes their distribution and concentration in order to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onology of the site and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of each period of occupation. For this case-study, the authors chose the Hanshu site for its rich cultural content, and it also can be viewed as an attempt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ettlement in the Nen River valley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ancient people and their environment.